

# 近人有關李觀與王安石 關係諸說之商榷

夏 長 樸

## 一、引 言

李觀（西元一〇〇九年～一〇五九年）與王安石（西元一〇二一年～一〇八六年）是北宋中期江西學派的代表學者，兩人以深厚的經學素養為基礎，重視功利，主張積極有為，強調改革之必要，充分表現儒學「經世致用」的特色。在慶曆、熙寧時代的學術環境中獨樹一幟，與同時並起的理學諸儒相互輝映，展露不同的學術面目。

由於李、王兩人同為江西人，年齡相差十二歲，在經世思想上有相當程度的相合，<sup>①</sup>因此近代學者從胡適開始對兩人之間是否有思想淵源關係一事，多持肯定的態度。胡適是民國以來首先表彰李觀的人，在他的「記李觀的學說」一文中，<sup>②</sup>胡適不僅推崇李觀是「一個不曾得君行道的王安石」，並且還是「王安石的先導，是兩宋哲學的一個開山大師。」由於胡

① 李觀與王安石在經世思想上，有頗多的相合之處，筆者曾撰「李觀與王安石的關係」一文做深入的討論，該文收在拙撰「李觀與王安石研究」一書中，請參看該書頁二一三至二五六。大安出版社印行，民國七十八年五月出版。

② 胡適的「記李觀的學說」一文，發表於「努力週報」「讀書雜誌」第三期（民國十一年，十一月），後來收入「胡適文存」二集卷一，開始引起國內學界對李觀的注意。此後如鄒材的「李觀土地經濟論綱領」（民國二十二年，六月）、譚丕樸的「李王的政治哲學」（民國二十四年，四月）、大癡的「李觀的社會文學」（民國二十六年，十月）等相繼發表，李觀逐漸成為學界注意的對象。

適在學術界的地位崇高，影響力極大，這個說法很容易就被研究哲學思想與政治思想的學者們所接受，同時也「李王」並稱，肯定二者之間有一定的關係存在。<sup>③</sup>侯外廬即曾說：「李觀、王安石在思想上有某些關聯是可以完全肯定的。」<sup>④</sup>姜國柱更以斬釘截鐵的口氣說：「他（李觀）的富國、強兵、安民的政治改革主張和經濟理財措施給王安石以很大的影響。」並且斷言：「李觀的變法思想不僅是慶曆新政的理論基礎，而且是熙寧新法的前導。可以說李觀是王安石的先驅者。」<sup>⑤</sup>

李觀的經世思想與王安石的有相當程度的相合是不爭的事實，但是否可以據此而論定李觀的政經思想給王安石以很大的影響，又是另外一個問題。本文之作，主要在檢視近人對李、王關係的各種說法，希望藉著這個討論能釐清一些不必要的誤解，使讀者對所謂李、王的關係有比較正確而清楚的認識。

## 二、有關李觀與王安石關係諸說析論

胡適首先提出李觀是王安石先導的說法，他認為李觀與王安石的關係是可以證明的，胡氏提倡此說所依據的理由有三：（一）李觀、王安石都講「周禮」，李觀的「周禮致太平論」「國用」十六篇的許多主張和王安石一致。（二）李觀的學生鄧潤甫（溫伯）參與了熙寧變法，是王安石變法的一員

③ 如譚丕模在「李王的政治哲學」一文中說「李觀是北宋小地主解放運動之理論大家，王安石是北宋小地主解放運動之前衛戰士」。薩孟武也說「李觀為革新派的理論家，王安石則為革新派的實行家。」譚文載「（北）師大月刊」第十八期，頁一九六一二〇八，民國二十四年四月。薩說見氏著「中國政治思想史」，頁三九六，三民書局，民國六十六年八月增補三版。

④ 見侯外廬主編「中國思想通史」，第四卷上冊，頁三九八。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九年。

⑤ 姜國柱，「李觀思想研究」，第八章「李觀思想的源和流」，頁一四六，又一四八。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八四年九月。

健將。鄧潤甫曾在熙寧變法時代奏上李觀的遺著，為李觀的兒子李參魯請官。(⇒)李觀與王安石同為北宋江南西路(今江西省)人。⑥

胡適認為「李觀和王安石的关系可以證明」，這一個敘述語意相當含糊。如果只是指「他們是有關係的」，指涉的範圍很廣，也可以說得過去，不在本文討論的範圍之內。這一句話若是指「李觀對王安石的思想有影響」的話，那麼胡適提出的理由只能證明「有此可能」，不能證明「必然如此」。試就胡適所舉出的理由而言，(一)李觀著有「周禮致太平論」，王安石也著有「周官新義」，兩人都重視「周禮」這一部書，也都以「周禮」做為一己立論的依據，足見兩人的思想同出於「周禮」，並且的確在實用主張上有相同之處。但這個證據僅能證明李觀與王安石的實用觀點相同，思想淵源相同。雖說李觀年長於王安石，但不能據以認定王安石曾受李觀影響。(二)李觀的學生鄧潤甫參與了王安石的變法，並在神宗熙寧七年(西元一〇七四年)六月奏進李觀遺著十七卷，原因是李觀「子孫零落，無綴仕籍者。」替李參魯謀求一官半職，照顧恩師的後人。⑦此時王安石正罷相，以吏部尚書觀文殿大學士出知江寧府，不在朝廷，⑧沒有資料顯示王安石曾參與此事。既然沒有明顯的證據能證明王安石曾參與此事，所謂王安石等人引李觀為同調的說法自然不能成立。(⇒)至於李觀與王安石是江西同鄉一事，只能做為相關資料，不能證明李觀曾影響王安石，也是顯而易見的。漆俠在「王安石變法」一書中曾針對胡適的說法加以駁斥，他說：

能否因李觀、王安石都談「周禮」就說王安石變法源自李觀？不

⑥ 胡適的說法見「記李觀的學說」，收入「胡適文存」二集卷一，頁三二至三六，頁四七。遠東圖書公司本，民國五十七年十月二版。

⑦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五四，總頁二六七三。世界書局影印本，民國六十三年六月三版。

⑧ 同前書，卷二五二，總頁二六五六。王安石罷相在熙寧七年四月丙戌，朝廷從許將、鄧潤甫之請，「錄進士李參魯為郊社齋郎」在六月癸巳。兩事相距二月之久，如果没有其他資料佐證，不能據以認定王安石曾參與此事。

能。「周禮」作為古代思想資料之一可以供他們攝取，這固然有助於他們的政治觀點的形成，但他們的政治觀點之真正形成則取決於複雜的社會條件。……所以，儘管李觀、王安石同講「周禮」，但在對待豪強兼并這個重要的現實問題上，李觀帶有濃厚的妥協的色彩，而王安石則採取抑制的態度，這正是同樣抱著改良願望的李觀和王安石重要分歧之處。顯而易見，胡適的第一個理由是根本不能成立的。至於胡適的第二個理由。……他（胡適）就該知道這一事實：在慶曆年間范仲淹主持改革之日，歐陽修並未因范仲淹不是江西人而不予幫助；在熙寧年間王安石變法之時，歐陽修亦並未因王安石是江西人就不加反對。「王安石變法」頁四至頁六，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六月第六次印刷本。

漆俠也認為以李觀、王安石都講「周禮」和同為江南西路人這兩個理由不足以證明王安石變法淵源李觀。由此可見胡適舉出的證據不夠充分，實在無法據以推出李觀的思想必然會影響王安石的結論。

侯外廬在他的「中國思想通史」中，曾依據王安石「臨川文集」卷七十七的「答王景山書」，<sup>⑨</sup>認為王安石與李觀有過交往，又據兩人同是江西人，李觀的學生鄧潤甫參加變法工作及鄧潤甫曾在熙寧中獻上李觀遺集等三點，肯定兩人在思想上有某些關聯。<sup>⑩</sup>除「答王景山書」是侯氏新提出的證據外，侯氏的其他理由完全因襲胡適的說法，此處不擬重覆討論。至於「答王景山書」的問題，留待討論姜國柱論點時一併處理。

姜國柱是探討李觀與王安石關係最詳盡的學者，在他的「李觀思想研究」一書中，他舉出四個理由，用來證明李觀與王安石有思想淵源的關係，由於原文過長，不便詳舉，此處僅能撮舉要點：(一)王安石在「答王景山書」中，曾說明他與李觀的思想聯繫。(二)李觀的兩個弟子鄧潤甫、曾鞏

<sup>⑨</sup> 文見「臨川先生文集」卷七十七，頁八一九。華正書局影印本，民國六十四年四月臺一版。下引同。

<sup>⑩</sup> 參註④。

與王安石的關係非常好，又積極參與王安石的變法工作，足見王安石對李觀的思想是接受了，並不是排斥的。(三)李觀與王安石都以「周禮」的理財思想為依據，提出許多經濟、政治的改革意見，這些意見有許多相同之處，可見其思想的淵源關係。兩人在人性論和禮論學說上，也有其極相近之處。(四)從李觀與王安石同為江西人來看，他們的思想確實有聯繫，特別是通過李觀的學生鄧潤甫、曾子固的中間環節，而使這種聯繫更為密切，他們同作為江西派，地域的相近不能不說是起了一定作用的。<sup>①</sup>

姜國柱的看法，明顯的是在胡適與侯外廬的基礎上又做了進一步的闡明，這個看法是否能成立呢？要回答這個問題的最好法子是一一檢視姜氏提出的證據，並且檢討他對這些資料所做的解釋與說明。首先讓我們看看王安石的「答王景山書」，王安石說：

某愚不量力，而唯古人之學，求友于天下久矣。聞世之文章者，輒求而不置，蓋取友不敢須臾忽也。其意豈止于文章耶？讀其文章，庶幾得其志之所存。其文是也，則又欲求其賢，是則固將取以為友焉。……書稱歐陽永叔（修）、尹師魯（洙）、蔡君謨（襄）諸君以見比，此數公今之所謂賢者，不可以某比。足下又以江南士大夫為能文者，而李泰伯（觀）、曾子固（鞏）豪士，某與納焉。江南士大夫良多，度足下不徧識，安知無有道與藝閉匿不自見於世者乎？特以二君概之，亦不可也。況如某者，豈足道哉？恐傷足下之信，而又重某之無狀，不敢當而有也。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聖人之言如此，唯足下思之而已。聞將東游，它語須面盡之

「臨川先生文集」，卷七十七，頁。<sup>②</sup>  
八一九，華正書局本，下引同。

① 參見姜國柱撰「李觀思想研究」，頁一四八至一五一。

② 文中「足下又以江南士大夫為能文者」一句，姜國柱引文作「足下又以江南士大夫為无能文者」，多一「无」字。姜氏所據為「王文公文集」本，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四年版，今未見。然「四部叢刊」本「臨川先生文集」及其他各本均無「无」字。

姜國柱對這段文字的解釋如下：

王安石自己明確道出，他以李觀、曾鞏爲友，並對李觀、曾鞏的思想是「某與納焉」。這就是說，王安石吸取和採納了李觀等人的思想。當然王安石不是兼收並蓄，而是有所去取的，王安石對各家各派學說都是採取這個態度。他在「答曾子固書」中說：「某自百家諸子之書，至於『難經』、『素問』、『本草』、諸小說，無所不讀，農夫、女工，無所不問。」王安石對各家學說均能博覽約取，對李觀的思想則尤其如此。從王安石對李觀的稱讚中，說明了他們思想的淵源關係。「李觀思想研究」，頁一八四。

姜國柱在這裏強調「王安石吸取和採納了李觀等人的思想」，他的依據是引文中王安石所說的「某與納焉」一語。在姜氏以前，侯外廬即曾引用「李泰伯……某與納焉」這句話來證明王安石與李觀有過交往；姜國柱應該是以侯氏的說法爲基礎，並且做了進一步的引申。但是這個說法能不能成立呢？依筆者管見，關鍵就在「某與納焉」的「納」字上。從侯外廬的行文看來，他把「納」字解作「納交」之意，「與」字作連詞用。這種解釋看似合理，其實是斷章取義，誤解了王安石的原意。王安石的上文說：「書稱歐陽永叔、尹師魯、蔡君謨諸君以見比，此數公今之所謂賢者，不可以某比。」很明顯的，王景山來書拿王安石與歐陽修、尹洙、蔡襄相比，王安石才會有「不可以某比」這種表示。在「某與納焉」的下文中，王安石說：「江南士大夫良多，度足下不徧識，安知無有道與藝閉匿不自見於世者乎？特以二君概之，亦不可也。況如某者，豈足道哉？恐傷足下之信，而又重某之無狀，不敢當而有也。」在這裏王安石不僅不同意王景山拿李觀、曾鞏做「江南能文之士」的代表，並且堅決反對王景山將自己也列入其中，這一點在「況如某者，豈足道哉」與「又重某之無狀，不敢當而有也」二語中，表示得十分清楚。總結上、下文說來，王安石既不同

意王景山拿他與歐陽修、尹洙，相提並論，也不贊成王景山舉他與李觀、曾鞏爲江南能文之士的代表，全文的主旨十分明確，不應有任何疑問之處。由此看來，「某與納焉」的「納」字，正確的解釋應是「納入」，「與」字是「參與」之意，「某與納焉」是「將我列入其中」的意思。侯外廬的說法並不正確。姜國柱把這話說成「王安石吸取和採納了李觀等人的思想」，未免有求之過深之嫌，並使得上下文的文章不相連貫，根本違背了作者的原意。因此，從王安石的「答王景山書」中，所能確定的是王安石知道李觀其人，並且推崇李觀、曾鞏爲豪士，如是而已。至於李觀與王安石是否有交往，則不得而知。當然看不出王安石如何「吸取和採納了李觀等人的思想」，更見不到王安石在博覽約取之下，「對李觀的思想則尤其如此」之處了。

其次，姜國柱提出歷史資料的記載，證明曾鞏與鄧潤甫是李觀的學生，兩人與王安石的關係非常好，又積極參與王安石變法，從而肯定王安石對李觀的思想是接受而非排斥的。姜國柱的這個說法，筆者以爲頗有商榷餘地。鄧潤甫是李觀的弟子，「宋史」「李觀傳」及「直講李先生文集」都有明確的記載，應該不是問題。然而把曾鞏也列爲李觀的弟子，卻不無可議之處。姜國柱持此說的立論證據凡四：

(一)「直講李先生門人錄」轉引「盱江舊志」云：「曾舍人鞏、鄧左丞溫伯，皆先生之高弟。」<sup>⑬</sup>

(二)明成化八年羅倫撰「建昌府重修李泰伯先生墓記」云：「南豐曾子固，其高弟也。」<sup>⑭</sup>

(三)清康熙甲辰（三年）陸瑤林撰「李泰伯先生文集敘」云：「李觀

<sup>⑬</sup>「李觀集」頁五一，「直講李先生門人錄」。漢京文化事業公司影印本，下引同。

<sup>⑭</sup>「李觀集」，外集卷三，頁四九一。

雅志歸林，高尚其事，雍雍然效教授河汾之致，一時門人如曾子固、鄧潤甫，其表著焉。」<sup>⑮</sup>

(四) 清康熙乙丑(四年)李來泰撰「宋泰伯公文集敘」云：「曾子固、鄧潤甫皆其高弟也。」<sup>⑯</sup>

上述資料都指出曾鞏是李觀的弟子，乍看之下，似乎鐵案如山，無可置疑，細思之，卻又不然。(一)(二)(四)三條資料的作者不是明人就是清人，上距北宋，有相當長的年數，時代既晚，又未提出任何足資佐證的文獻資料，這種片面之辭，依常理判斷，是不宜用作證據的。(一)所舉出的「盱江舊志」，今已無考，但明成化年間左贊刻本「直講李先生文集」「直講李先生門人錄」末所附識語，已明駁其說非是，茲逐錄於下：

嘗讀「盱江舊志」云：「曾舍人鞏、鄧左丞溫伯，皆先生之高弟。」竊有疑焉。蓋溫伯他日爲中丞，進先生所爲文，奏乞官其一子，溫伯遊先生之門明矣。然不能排新法之非，識者惜之。今「盱志」以南豐並稱，不知何據？按：李直講生於祥符之己酉，曾南豐生於天禧之己未，以年數考之，則直講多南豐十歲也。若以直講南豐爲師友，恐不其然。謂其在鄉學師之歟？則直講以慶曆三年主郡學，而南豐以是年自洪州歸臨川，「上齊工部書」云：「祖母樂居臨川。」其後爲文多道臨川之事。謂其在太學師之歟？則直講以嘉祐二年爲太學說書，而南豐以是年登進士第，明年調太平州法曹，烏在其爲師友哉？「舊志」所載，若不加訂正，襲訛承舛，惟恐後人復誤後人也。「李觀集」「直講李先生門人錄」，頁五一。

這一識語不知出自何人之手？以理度之，此人的時代應在重編「盱江集」

<sup>⑮</sup> 「李觀集」，附錄三，頁五二四。

<sup>⑯</sup> 「李觀集」，附錄三，頁五二五。



的左贊之前，至遲應與左贊同時。<sup>⑭</sup> 識語從年齡、李觀講學時間各方面證明曾鞏不可能從李觀受學，議論精關，可以證明「盱江舊志」的說法不能成立。事實上，姜國柱所用的「李觀集」即附有此一識語，<sup>⑮</sup> 不知何故未對此論提出具體的反駁意見？此外，其他可靠史料若「宋史」、「東都事略」、「盱江文集」、「元豐類稿」、兩家年譜，也都沒有類似「盱江舊志」的記載。<sup>⑯</sup> 退一步說，縱使果如「盱江舊志」所言，曾鞏、鄧潤甫都是李觀門下高弟，也不能據兩人與王安石交好，又參與熙寧變法，就肯定王安石對李觀的思想是接受的而非排斥的。姜國柱的此一推論有兩個基本預設：(一)學生與老師的學術是完全相同的；(二)兩人交往與參與活動是學術而非個人行爲（簡言之，爲人與學術是等同的）。如果這兩個預設都能成立，才能據以推出他的結論，所謂王安石對李觀的思想是接受而非排斥的。就上述第一點來看：學生即使與老師非常接近，由於個體的差異，師、弟之間的

⑭ 左贊是明成化時人，「四庫全書總目」「盱江集提要」云：「此集爲南城左贊所編。凡詩文雜著三十七卷，前列「年譜」一卷，後以制誥薦章之類爲外集三卷，蓋非當日之舊。」

⑮ 見北京中華本「李觀集」頁五一。姜國柱「李觀思想研究」頁十一，小註①即標明該書所用「李觀集」乃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版。本文所用「李觀集」即漢京文化公司據中華本影印者。

⑯ 唯一例外的是清乾隆四十二年李夢桂補修本「盱江先生全集」（即文海出版社影印之「李泰伯全集」本），外集卷五「盱江先生門人錄」，在饒景先、王幾之間有「曾鞏，南豐人，久學於先生，名宦理學。」等十四字，「門人錄」末亦無辨正「盱江舊志」識語。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影印明成化左贊編何喬新校正本「直講李先生文集」，「門人錄」在饒景先、王幾之間則作「杜萬，南城人，居谷口，先生有詩送之」等十四字，末附辨正「盱江舊志」識語。以今觀之，現存各種李觀文集刊本中以成化本爲最早，三十七卷本（附年譜一卷，外集三卷）之編輯亦出左贊之手。明清以下三十七卷各本皆由成化本出，李夢桂補修本（所謂家塾藏本）自不例外。何以成化本作「杜萬」處，而後出的李夢桂補修本反而作「曾鞏」？筆者頗疑李氏子孫（康熙重刊之李化繁，乾隆補修之李夢桂都是李觀的後人）爲了光耀自家祖先，在刊印時有所更動，刪去「杜萬」而代之以「曾鞏」，並刪除辨正「盱江舊志」識語，才會有這種情形出現。

學術思想多少總會有所出入，如顏元與李塨；甚或相差極大的，如荀子與韓非。可見學生與老師的學術思想是不可能完全相同的。再就第二點來說，與某人締交並且參與某些政經活動，也並不表示二者之間必然有相同的學術思想，如莊周與惠施為摯友，兩人的學術立場卻大不相同，即是顯例。由是可知，姜國柱的兩個預設是不必然的。姜氏的預設既然有問題，自然不能據之推出他的結論。

至於姜國柱就李觀與王安石都以「周禮」的理財思想為依據，兩人所提出的經濟與政治改革意見有許多相同之處，因此認定兩人有思想的淵源關係。關於這一點，姜國柱與胡適所面臨的問題是一樣的，除非能找到具體的直接證據證明李觀與王安石有來往，否則不能據此認定兩人有思想的淵源關係，至多只能說「有此可能」而已。李觀雖較王安石年長十二歲，但兩人所處的時代環境相同，又都同樣關心國計民生問題，不約而同以「周禮」為依據，提出大致相同的解決方案，這個可能性是相當高的。

姜國柱認為「李觀與王安石在人性論和禮論學說上，也有其極相近之處」，這個說法並不正確。李觀在人性論上反對孟子的性善說，接受韓愈的性三品說，論性而不論情，<sup>⑳</sup>以性與禮對舉，「性畜於內，法（禮）行於外」，<sup>㉑</sup>性待禮而後明。這種看法與王安石早年主張性無善惡，晚年服膺孟子性善說，力主「性者情之本，情者性之用，故吾曰性情一也。」<sup>㉒</sup>以未發已發分性情的見解，<sup>㉓</sup>有極大的區別。至於禮論方面，李觀與王安石

⑳ 「李觀集」卷二，頁十八，「禮論六」：「古之言性者四：孟子謂之皆善，荀卿謂之皆惡，揚雄謂之善惡混，韓退之謂性之品三：上焉者善也，中焉者善惡混也，下焉者惡而已矣。今觀退之之辯，誠為得也，孟子豈能專之？」

㉑ 「李觀集」卷二，頁十一，「禮論四」。

㉒ 「臨川先生文集」卷六十七，頁七一五，華正書局影印本。

㉓ 有關王安石的性情說，請參閱拙撰「王安石的經世思想」，頁二十六，「論性情」。國立臺灣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民國六十九年。

雖然在禮的起源上同主禮之起在順人之性欲而加以節制，<sup>24</sup>但是在禮的範圍上，兩人卻有明顯的不同，李觀將禮從五常中獨立出來，成爲一切法制的總稱，樂、政、刑及仁、義、智、信等，全在禮的範圍之內。<sup>25</sup>他說：「禮者，虛稱也，法制之總名也。」<sup>26</sup>由於禮是法制，不是性，<sup>27</sup>因此，禮是後天人爲的，不是先天而有的。王安石則沒有這麼大膽的突破，禮依然是五常之一，他主張「禮始於天，而成於人。天則無是，而人欲爲之者，舉天下之物，吾蓋未之見也。」<sup>28</sup>此一禮是「天生人成」的觀點和李觀的差異是顯而易見的。這和姜國柱提出的看法有著相當大的差距，不僅不能用以證明李觀與王安石有思想淵源的關係，相反的，適足以證明兩人在思想上有淵源的可能性不大。

姜國柱在第四個理由上，試圖用兩人同爲江西人這一點，證明李觀與王安石在思想上確實有聯繫。關於這一種論點，漆俠在批評胡適時已舉歐陽修幫助范仲淹卻反對王安石爲例，說明此一觀點並不可靠。此外，據蔡

<sup>24</sup> 「李觀集」卷二，頁六，「禮論第一」云：「夫禮之初，順人之性欲而爲之節文者也。」而王安石「臨川先生文集」卷六十六，頁七〇二，「禮論」云：「今人生而有嚴父愛母之心，聖人因其性之欲而爲之制焉。故其制雖有以強人，而乃以順其性之欲也。」可見李觀與王安石在禮之起源上的觀點是一致的。

<sup>25</sup> 「李觀集」卷二，頁五，「禮論第五」云：「是皆禮也。飲食、衣服、宮室、器皿、夫婦、父子、長幼、君臣、上下、師友、賓客、死喪、祭祀，禮之本也。曰樂、曰政、曰刑，禮之支也。而刑者，又政之屬矣。曰仁、曰義、曰智、曰信，禮之別名也。是七者，蓋皆禮矣。」關於李觀的禮論，請參閱拙撰「李觀的重禮思想及其與荀子的關係」，臺大中文學報第二期，頁二六五至二八二，民國七十七年十一月出版。

<sup>26</sup> 「李觀集」卷二，頁十四，「禮論第五」。

<sup>27</sup> 「李觀集」卷二，頁十四，「禮論第五」云：「法制之作，其本在太古之時，民無所識，飢寒亂患，罔有救止。天生聖人，而授之以仁、義、智、信之性，仁則憂之，智則謀之；謀之既得，不可以不節也，於是乎義以節之。節之既成，不可以有變也，於是乎信以守之。四者大備，而法制立矣。法制既立，而命其總名曰禮。安有禮之性哉？」

<sup>28</sup> 「臨川先生文集」卷六十六，頁七〇二，「禮論」。

上翔「王荆公年譜考略」所載，王安石在十九歲以前，隨父仕宦各地。寶元二年（西元一〇三九年），安石父王益卒於通判江寧（今南京市）任上，葬於江寧牛首山，子孫遂定居江寧，是時安石十九歲。由這樣看來，王安石的地域觀念應該不會很強。姜國柱強調「他們同作為江西派，地域的相近不能不說是起了一定作用的。」<sup>29</sup>這種看法過於樂觀，用作證據其說服力是不夠的。

### 三、結 語

綜合上述的討論來看，胡適、侯外廬及姜國柱等學者所提出的李觀與王安石之間有思想淵源的看法，就他們所掌握的文獻資料而言，仍然是一個證據不夠充分的假設而非定論。目前可以肯定的是：李觀是北宋慶曆時代的一位大思想家，他的許多主張都是針對當時政治、社會的弊病而發的，具體表現了儒家傳統重視經世致用的本色。李觀與王安石之間雖未必有思想淵源的關係，但兩人在重視致用的前提下，各自探討當時政治，以「周禮」為依據提出解決方案，所得出的結論竟然有許多暗合之處，<sup>30</sup>的確是饒富趣味。假若李觀有機會得君行道，一償醫國濟世宿願的話，「熙寧新法」的種種改革措施不是沒有可能提前出現的。<sup>31</sup>

<sup>29</sup> 姜國柱「李觀思想研究」，頁一五五。

<sup>30</sup> 蕭公權即認為「吁江學術之精神與臨川固有暗合之處」。見蕭氏著「中國政治思想史」，頁四八七，聯經出版事業公司本，民國七十三年四月第三次印行。

<sup>31</sup> 本文構思期間，部分疑難之處，曾與葉國良、何澤恆二兄討論，獲益良多，特此致謝。